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一九九〇年代美國對台海兩岸之政策取向

doi:10.30390/ISC.199312_32(12).0001

問題與研究, 32(12), 1993

Wenti Yu Yanjiu, 32(12), 1993

作者/Author：蔡瑋

頁數/Page：1-1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3/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312_32\(12\).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312_32(12).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一九九〇年代美國對台海兩岸之政策取向

蔡 瑋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壹、前 言

在後冷戰時期，美國對台海兩岸之政策是否會有所變化，是一備受關切的問題。尤其是自「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美國與中共之間的摩擦不斷，同時也對台灣軍售，使三邊關係更現微妙轉變。本文重點將由美國的角度來分析解釋在未來十年的歲月裡美國對台海兩岸政策的基調，可能的變化，問題的所在，以及將來的可能發展方向等。至於中共與台灣方面的反應，以及彼等的對美政策由於不是本文立論的重點，所以將留待另文討論，有關中國大陸和台灣兩者之間在比例分配上的差異明顯可見，其原因應該是可以理解的，這些都是該先行予以說明的。

另外，無可諱言的是，要研究，並以合理方法評估美國在未來十年內的中、長期對華政策恐怕仍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存在，因為這其中潛藏有太多不可預知的變數，及人力無法改變的因素。舉凡國際局勢的變化，美國國內及中共本身的政、經實力的改變，台海兩岸關係的演變，甚至連中共領袖人物及美國政府的更替都可能對這個錯綜複雜的三角關係產生很大的影響。筆者無意、恐怕也不可能對此問題有全面的評估，只希望能以有限的知識，在既有的基礎上，由政治層面著手，儘量作周全的研析罷了。

貳、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

論者每謂美國的對華政策有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也有鷹派、鴿派之別。理想主義者強調美國立國的精神，重視人權、自由、民主這些抽象的概念，並希望將此意識形態推廣及於中共及世界各地；現實主義者則重視中共的戰略價值，美國的現實

國家利益，強調的是地緣政治、權力平衡、戰略關係等現實的問題。鷹派主張以強硬的態度對付中共，以具體的實力來爭取國家利益，或對抗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行爲；鴿派則較傾向於以柔性的方式、以低調的方式來爭取國家利益，也不排除以妥協、甚或姑息的方式來解決與中共之間的爭端。

其實，理想與現實，鷹派與鴿派的分別並不是絕對的。當理想和現實衝突的時候，妥協是無可避免的，現實主義並不代表一無理想的成份，理想主義也不能完全無視於現實的世界。鷹派、鴿派觀點互異固係事實，但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之下，對不同的議題，角色互異的可能性當然存在。由歷史的角度來看，近代的美國對華政策往往是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擺盪，在鷹派與鴿派之間試圖尋求一個平衡點，但其中唯一不變的特色就是追求美國的國家利益。

說穿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目的，或唯一目標，根本就是希望以最小的代價追求最大的美國國家利益，（其實世界上每個國家莫不如此），鷹派固然如此，鴿派也不例外，理想主義這樣，現實主義也無不同，歷屆美國政府都會高喊人權、民主、自由的口號，其間只不過是程度、方法、重點的出入罷了。在國際政治的舞台上，當國家利益和道德、理想能夠結合的時候，就祭出道德的美名，但是當國家利益和道德、理想的標準有了出入的時候，國家利益就成了追求的唯一依據了，這時道德、理想都成了次要的考慮。

準此，我們首先要確定的是：當前美國的國家利益、外交基本原則究竟在那裡？據美國總統柯林頓所言，當前美國的國家利益，也就是新外交政策的三個主要支柱是：一、使美國的經濟復甦；二、在目前這種新的局面下，使美國的國防力量現代化；三、藉著擴散自由、和平、繁榮、人權、保障民主，來維護美國的安全。①簡單的說，美國當前的國家利益及基本外交政策可以約略的歸納爲：國際及國內政治上的安定，美國本身經濟上的成長、復甦，以及安全上的保障。下面我們將再進一步詳細的予以分項說明。

一、在政治外交方面：美國政府堅信，民主制度雖然有其缺點，各國發展、適用的情形也各不相同，但是歷史事實顯示，民主制度確實有助於世界的和平和區域性的安定。民主國家會是較好的鄰居，因為這些國家不但經濟較爲發達，政治也較爲穩定，它們既不會彼此動武，也不會製造難民，更不會進行由國家所支持的恐怖活動和毒品交易，它們不但尊重自己國民的人權，也較主動關心世界各地的事務。

所以推銷民主的觀念、制度並不僅僅只是意味著擴散西方的價值標準，因爲這不但合乎各該國本身的利益，有助於當事國政治的安定、經濟的成長，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當然這也合乎美國的長遠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了。②至於推動此一

註① Warren Christopher, "Budget Priorities for Shaping A New Foreign Policy",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March 15, 1993, Vol. 4, No. 11, pp. 137-138.

註② Winston Lord, *East Pacific Wireless File (EPF)* 204, August 31, 1993.

目標的方式，由於美國國力已經大不如前，在主觀意願、客觀能力都有限制，國會及民意也有不同意見的情況下，美國可能以間接的方式，透過積極參與（constructive engagement）或和平演變（peaceful evolution）的方法，藉著集體的力量，如聯合國或其他國家的合作來實現此一目標。

美國政府鼓吹民主的這個原則不僅適用於前蘇聯的各個共和國、東歐各國，也同樣適用於中共和台灣。對台灣來說，由於中華民國在政治方面已經相當的民主、開放，中、美之間在這方面發生爭議的可能較小，相反地，我們可以預見中共和美國今後在人權、和平演變方面會有相當程度的摩擦和爭議。

二、在經濟方面：一九九二年美國大選的主要議題是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柯林頓之所以能夠當選美國總統主要也是因為美國民眾對於共和黨經濟政策的不滿，以及長期的經濟衰退所致，柯林頓的天命（mandate）既然是在經濟方面，那麼他把施政重點放在如何振興美國經濟也就毫不足奇了。正如美國新任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及商務部長布朗（Ron Brown）所言，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內部問題叢生還能對外持續強盛的，柯林頓政府在今後一段期間之內，必然會把工作重點置於經濟計劃上，美國必須維持國內的經濟發展，確保本身長期的繁榮。^③

經濟改革可以分為對內、對外兩個部份。在對內方面，柯林頓政府將採取措施，減少財政和貿易赤字，協助強化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量，刺激景氣，提出經濟振興方案；在對外方面，美國將盡一切可能排除貿易障礙，消除各種壁壘，保障美國產品的競爭力。經濟外交（economic diplomacy）這個名詞最足以反映出柯林頓政府未來對外經濟政策的重點。原則上，美國將鼓勵全球各國朝市場經濟的方向發展，採取全球性的戰略，希望以烏拉圭回合談判（Uruguay Round）及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為藍圖，奠定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基礎，反對經濟的地區化及壁壘化。^④

美國的這一套經濟外交戰略在可預見的將來不但適用於世界其他地區，也適用於台灣及中共。由於台海兩岸政府都相當依賴美國市場，而美國為了維護本身的經濟利益，未來顯然將更不會容忍不公平的貿易措施，對公平貿易重視的程度恐也將遠超過對自由貿易抽象原則的尊重，^⑤雙方將來和美國在這方面發生爭執的可能性最大。

三、在安全方面：冷戰結束之後，國際政治和安全環境有了重大的變化。在近代歷史上，美國首度沒有一個立即、明顯可見的敵人，但是於此同時，美國國力衰退已成事實，民意也有內縮跡象，美國已經不能再像以前一樣把自己的意志強加（dictating）在其他國家之上，柯林頓總統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是本身的經濟困境。在未來相當一段的時間內，美國政府恐怕

註③ Warren Christopher, *op. cit.*; and Ron Brown, *East Pacific Wireless File 306*, March 10, 1993.

註④ Winston Lord, *op. cit.*

註⑤ Ron Brown, *op. cit.*

將不會有餘力主動對外生事，挑起事端，在國際事務上將多半會著重於解決當前的危機，也會多傾聽其他國家的意見，合作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將遠大於以往的獨斷獨行，但是當美國重大國家利益（vital interest）受到影響的時候，美國仍然可能採取單獨行動。^⑥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採取了所謂的預防性外交作為（preventive diplomacy），希望透過強勢的多邊主義（assertive multilateralism）、責任分攤（burden-sharing）、區域安全對話（regional dialogue）的方式來減輕本身的負擔，並追求最大的國家利益。柯林頓政府將積極界定其海外承諾的範圍，今後首要工作可能放在和平維護（peace-keeping），次要選擇才是和平重建（peace-making）。^⑦

換而言之，柯林頓政府確信預防重於治療，此一政策如果執行得當將能減少日後龐大的人力及物力的支出。當前美國在安全規劃方面最引以為憂的就是核子武器的繁衍，和飛彈等高科技武器的擴散。華府以為冷戰結束，世界性大規模衝突的可能性已經減少，但這並不意味著國際社會就更為安定，舊的問題解決，但是新的問題更是層出不窮。後冷戰時期的國際局勢隱藏了更多不確定的因素，區域性、小規模的熱戰仍會出現，如果核武、高科技軍事裝備的流向不受管制，必將對世界的和平安定構成嚴重威脅。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必將把重點置於這個方面。

美國的這套區域對話、防止核武繁衍的安全規劃固然適用於中華民國和其他各地，但就實際而言，恐怕更適用於美國和中共的關係。由於台灣和美國在安全方面的利益大體一致，都熱切盼望透過對話解決歧見，希望維持區域安全，所以中美雙方除了在台灣購買先進武器方面有些不同看法之外，其他方面應無太大衝突，倒是由於中共目前仍然持續對敏感地區出售先進武器，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和中共將在這些議題上有所摩擦。

於此必須一提的是，儘管美國民意有轉趨內向（inward）的跡象，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就會走向孤立主義，粗糙的民意（raw opinion）顯示，絕大多數的美國民眾同意今後美國不應把太多的精力置於國際事務上，而應更專注於解決美國本身的問題上，外交和國防的優先順序通常都排最後，^⑧但是更精緻的檢測則顯示，經過思考後的民意（public judgment）有百分之七十一的人認為美國仍應積極參與國際事物。^⑨

註⑥ Warren Christopher, *EPF 304*, June 29, 1993, 雖然克里斯多福在談話中仍然強調美國必須領導，而且是全面性的扮演領導的角色，但實際上不管是由主觀的意願和客觀的能力來看，美國都已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樣為所欲為，其談話多半只是對內鼓舞士氣，以國內政治的考慮為主。

註⑦ Henry Kissinger 也表示相似意見，詳見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第十版。

註⑧ Daniel Yankelevich, "U.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Election," *Foreign Affairs*, Special Features Service 106, p. 5, provided by USIA, Taipei.

註⑨ *Ibid.*, p. 6.

總而言之，未來數年內的美國對華政策基本上會循著前述的原則發展。在政治外交方面，美國必然會持續推銷其自由、民主的概念和制度，既希望中共以和平演變的方式由量變而質變，也期盼台灣變得更加民主、開放；在經濟方面，美國會鼓勵兩岸，尤其是中共，進一步走向市場經濟，融入自由經濟體制，但是美國也會反對任何不公平的貿易行爲，防止地區性的貿易壁壘出現；在安全事務方面，美國將不再一力承擔所有的國際義務，希望透過國際合作的方式，以區域對話的模式，解決彼此歧見，用預防外交來阻止衝突的產生。

至於美國爲什麼會採取這種外交政策呢？基本上，筆者認爲其中至少有下列的幾個理由：第一是美國經濟實力的持續惡化，這就迫使柯林頓必須把施政重點置於國內，沒有必要華府不會主動對外生事，或強要承擔更多的責任；第二是國際局勢的變化，美國已成世界僅存的超級強權，在可預見的將來，沒有任何國家有能力直接威脅到美國的立即安全，所以美國有條件回歸基本，開始重新強調一些原則性的問題；第三則是美國國力已經大不如前，華盛頓開始了解，它再也不能像以往一樣頤指氣使的使喚別的國家，它必須以伙伴的態度，更加尊重他國的方式來推動外交工作；④第四是民主黨本身較重理想主義，而柯林頓本人又缺乏外交的素養，沒有充份的經驗，不擅長外交，而且他還缺乏抽象思考、宏觀規劃的能力等等。⑤

叁、美國對華政策的現實考慮

由前面所談到的美國當前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我們可以了解這些原則在今後也將適用於中國大陸和台灣，下面我們將再由實務的角度切入，看看美國對台海兩岸政府究竟有那些現實的考慮。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的了解一個最根本、現實的因素，那就是中共地緣政治的份量、戰略價值及中共廣大的領土、人口、幅員這個因素。對美國來說，由於中共的廣大幅員和龐大的人口，中共本身的安定、動亂將對亞太地區，甚至世界的安定發生相當程度的影響，所以不論在中國大陸執政的政府是持著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政治、社會、經濟制度，美國都不能加以忽視，這純粹只是現實利害的考慮。

自一九七〇年代美國開始調整其對台海兩岸的政策以來，美國的對華外交政策設計者，不管是尼克森、福特、卡特、雷根、或布希政府都一直強調中共的戰略價值，歷屆美國政府並不一定喜歡中共政權，更不接受其意識形態，但美國不能不考慮到中共在牽制蘇聯擴張主義，及安定亞太局勢方面可能發生的作用。今天，蘇聯已經解體，中共的戰略價值已經大不如前，但是中共畢竟仍是一個區域強權（regional power），它仍有爲惡、製造不安的能力，美國必須藉著扮演介入平衡者（

註④ "America's Role in Asia: Interests & Policies", report prepared by the Center for Asian Pacific Affairs, The Asia Foundation, 1992, pp. 10-11.

註⑤ 美國傳統基金會 (Heritage Foundation) 會長 Edwin J. Feulner, Jr. 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於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座談會中曾對克林頓的外交能力多所批評。

engaged balancer) 的角色，以積極接觸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的方式保持對中共的影響力。^②

簡單的說，美國對中共的基本政策除了前面提過的基本原則——在政治上促使其民主化，經濟上走向市場經濟，在安全上和其保持對話之外，就是希望、鼓勵中共一貫維持其當前所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美國絕不希望見到中共重返當年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憤懣、排外、孤立，華盛頓確信一個安定、理性、改革、開放、具有安全感、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中共合乎其國家利益。^③在可預見的將來，不管中共領導人的更替或美國政府的更換，這個基於現實考慮的政策是不會有任何改變的。美國的政策過去如此，現在如是，將來也當一樣。

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就會毫無立場的一味容忍、甚或姑息中共的一些不合國際外交行爲的舉措，或「中」美雙方將一無歧見。目前，美國和中共之間的具體歧見包括有最惠國待遇案，北平的不良人權紀錄，不負責任的軍火外銷，不公平的貿易措施，奴工產品外銷等等。雖然這其中有些問題，如奴工產品外銷可能較易解決，或達成一些共識，但是就整體而言，在今後相當的一段時期內，「中」美雙方恐怕都只能在枝節上進行調整，多數問題恐怕都不容易有個徹底解決的辦法。

在人權問題上，華府和北平的認知不同，中共重視社會、經濟、集體人權，美國重視個人政治人權。對中共來說，人權問題涉及國家主權，是個原則性問題，不容美國對此指指點點，北平只可能在細微末節上有所調整、讓步，原則則是絕對不容妥協的。^④但是美國則認爲人權是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規範，根本不認爲人權應該有不同的標準或適用對象的問題存在。^⑤「中」美雙方對人權的爭執恐將一直持續下去，最惠國待遇案的解決方式則將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在軍售方面，一方面中共軍方亟須利用軍售盈餘來進行國防現代化，另一方面北平一向認爲自己的對外武器銷售相當的理性、節制，美國才是該檢討的對象，畢竟美國才是世界軍火外銷的第一大國。^⑥但是美國擔心的是中共對中東敏感地區及巴基斯坦的飛彈及核子科技的外銷會導致核武的擴散，從而引發大規模的衝突，或區域性的緊張情勢。^⑦「中」美雙方對此也只能就個案進行檢討、協調，求取共識，而不可能全然解決歧見。

在貿易方面雙方也是糾紛不斷，中共認爲美國統計的基數有問題，^⑧而美國則指控中共藉著操縱市場、關稅壁壘來從事

註② Richard Ellings and Edward Olsen, "A New Pacific Profile," *Foreign Policy*, No. 89, Winter 1992~1993, pp. 129~132.

註③ 蔡璋，「論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國對中共政策」，美國月刊，第七卷第一期，民國八十一年一月，第二十一頁。

註④ 鏡報月刊(香港)，一九九三年九月，第四十一頁。

註⑤ Winston Lord, *EPF 204, op. cit.*

註⑥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二頁。

註⑦ President Bill Clinton's May 28 statement on China/MFN, *EPF 504, May 28, 1993.*

註⑧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九日，第二頁。

不公平貿易。鑑於中共歷年均對美享有高額順差，去（一九九二）年是一百八十億美元，今年金額恐更將高達二百餘億美元以上，^⑨而美國目前受困於經濟不景氣，柯林頓政府當前首要施政重點在於振興經濟、爭取市場，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恐將較以往更爲重視公平貿易，美國必然會迫使中共更開放其市場，中共與美國在這方面的爭執只怕會更形惡化，摩擦只會增加而非減少。

前面我們多半是從負面的角度來看，說明美國必須和中共維持關係的重要性，現在我們再由正面的方向來說明合作對它們彼此之間的有利之處。首先，在安全、外交方面，美國與中共的密切合作，消極的將可使雙方減少許多的困難、摩擦的機會，積極的更可以使它們團結一致，合力安排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新秩序，爭取對自己最有利的結果；在經濟方面，鑑於中國市場正快速成長，美國亟須大舉打入、攻占中國大陸的市場，這對美國的經濟復甦將有正面助益，而中共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仍然需要美國廣大的市場，以維持其高速的經濟成長。

不管是由理想或現實的層面考慮，也不管是由正面或負面來加以觀察，美國其實都深切的了解，任令「中」美關係毫無止境的持續惡化下去並不必然合乎美國的長、短期國家利益。維持對話、保持接觸只是最起碼的需要，如果可能的話，使雙方的關係朝向正面、建設性的方向演變，似乎更能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既然如此，美國對中共採取積極參與以及預防性外交的措施也就不足爲奇了。

在這些既定的原則之下，美國的具體作法就是採取措施鼓勵中共融入國際社會，接受國際上的一般行爲準則，在中共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案上，美國應該會大力加以支持；在人權與最惠國待遇案上，理性的作法是分項、分階段的透過行政方式予以彈性的處理，而非包裹式的透過立法方式全面對中共加以制裁。^⑩這或許反而較易發生效果。

就整體來說，美國在主觀上既無與中共對抗的意願，客觀上又無此必要，再加上還有和中共維持往來的必要，得仰仗中共的合作之處，需要爭取中共的龐大潛在市場，所以一方面和中共保持對話，但另一方面又維持某種程度的壓力，對於中共合乎國際社會準則（或美國利益）的行爲，如尊重人權、遵守貿易規範、限制對外軍售給予支持、鼓勵，對於中共不合規範的行爲則不假詞色的予以抨擊，甚或不惜採取有限的制裁措施，以迫使中共就範。美國對中共的政策基本上就是一手棍子、一手胡蘿蔔的把戲罷了。

談到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政策，首先我們必須有一個基本的認識，那就是儘管華府可能在感情上較傾向於台灣，也較能認同中華民國的政、經制度，乃至於意識形態，台灣過去的經濟成就和政治民主化已爲美國所肯定，中美關係確有繼續改善的必要，也有繼續改善的空間，但這一切都不能完全扭轉美國在發展和中華民國的關係時，必須顧慮中共反應的這個事實。對

註⑨ 星島日報（香港），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二頁。

註⑩ "Washington's Angonizing Decision: To Extend or Revoke China's Most-Favored-Nation Trade Status," Background, Asian Studies Center, May 8, 1990, pp. 2, 9-10.

美國來說，中美關係未來的發展仍將在相當程度上受限於美國和中共的關係——除非局勢有了重大意外的變化。

基本上，美國的對台政策是無法完全擺脫其整個中國政策的考慮。華府認為，過去十多年的歷史證明其對華政策在大的方向上並無差錯，它既能和北平往來，也能和台北保持友好關係，而且兩岸也未因此而兵戎相向。在政策上並無錯誤，實際情形又運作良好的情況下，在可預見的未來，除非情勢發生巨大變化，否則美國對台海兩岸的政策應無太大變動。美國應該仍會堅持其由中國人自行解決兩岸爭執，不擅自介入的既定原則。

也正因為美國顧慮中共的反應，美國即使有心也不太可能和台灣恢復正式外交關係，但除此而外，台灣和美國在實質關係的改善和加強仍有廣大的空間，比如說，台北可以要求增加駐美辦事處的數目，增加雙方高級官員的互訪，以及軍售的質量再加以提昇等等。正如媒體日前所報導的，經過檢討之後，美國的對台政策將維持原則不變，但是在作法上可能將更趨靈活，^①更能配合時代的變化，反應現實的需要，這對中華民國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至於台北可能和美國起摩擦的地方仍以經濟方面為大，我方在智慧財產權、專利權方面的保障並未能夠完全落實，但美國有時也表現得過於強硬，未考慮我國國內政治生態問題已和過去不同，政府在行政事務上除了必須絕對依法行事之外，有時也得充份考慮民意的壓力，中美雙方在這方面的摩擦將不時產生。另外，在環境保護、尊重自然生態及動物保育方面可以預見也會發生一些困難。

最後，筆者想強調的是，跡象顯示美國並不希望或樂於見到中國（尤其是共產主義控制下的中國）的強大，在某種程度上說來，美國目前所面臨的是一個兩難的困境。如果中共發生大規模的動亂，或極端的排外，這對世界的和平和安定都沒有好處，但是如果中共能夠長期維持改革、開放的政策於不變，保持穩定，繼續不斷的追求經濟成長，不發生政治上的動亂，以中共的地大物博、人民的刻苦精神來看，就長遠來說，中共恐怕終將再起，目前已有擔心「中國威脅」再起言論的出現就是一個例子。^②

有朝一日，如果一個強大的中國（不管是不是在中共的控制之下）由區域性的力量成長為全球性的強權，它必然會要求「適當」的國際地位，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力，對世界事務恐怕自然也將享有較目前還大的發言權，由於中、美國家利益的不同，觀點的出入，屆時中共和美國之間的摩擦也恐將增多。對美國來說，一方面鼓勵中共持續其改革、開放政策，由量變而質變，誘導其走上和平演變的道路，改變其政權屬性，但另一方面又延緩其成長、茁壯的過程，使中共不可能在短期內就能坐大起來，這恐怕才是美國心中的如意算盤。換句話說，美國期盼的是一個民主、開放、理性、成熟、安定，但稍嫌衰弱，

註①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四頁。

註② 詳細內容請參考 Nicholas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3, pp. 59-74.

甚至必須以美國馬首是瞻的中共。

伍、結 論

柯林頓政府三年多以後是否會繼續執政沒人敢於預測，美國國內經濟情況是否好轉實在也不能持太過樂觀的看法，如果民主黨政府不能繼續執政，美國外交中理想層面的重要性可能受到貶抑。中共的經濟改革如無意外應會持續下去，但是其改革成效如何將對中共的國力、自信、行爲都會發生影響，這將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重要變數。中共權力繼承情形也難以逆料，雖然大家並不預見，也不期望中共因鄧小平的離去而大亂，但最後結果仍然有待觀察。保守派如果得勢，控制了政權，這是否會對「中」美關係產生負面影響也不能完全不加考慮。

同樣地，國際局勢的變化也不可預料，西方國家正盡全力防止共產主義再起，東歐亂象是否擴大，俄羅斯的民主改革是否奏效頗爲令人擔憂，如果類似冷戰情形再度發生，中共戰略價值有變，當然會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今後，兩岸關係多半會以謹慎、漸進的方式逐漸有計劃、有步驟的向前發展。但是，台灣內部政情的變化，國民黨是否仍能繼續執政，統、獨之間的爭議，總統直選的結果都會爲兩岸關係投下變數，兩岸關係的演變雖非影響「中」美關係的主要變數，但是兩岸關係的惡化可能又將美國捲入其所亟欲避免的困境之中。

在有這麼多不確定及不可控制因素存在的情況下，要預測未來將近十年的中美關係確實有其困難之處，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美國的對華政策仍將在理想與現實的困境中試圖找出一個平衡點。美國將希望中共在政治上走向民主、自由、尊重人權；在經濟上融入國際體制、實行市場經濟；在安全方面，透過區域安全對話，減輕國際緊張局勢。美國希望中共改革、開放、融入國際社會、避免孤立中共，約束其爲惡的可能的一貫立場是不會有所改變的。

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和中共對軍售、人權、貿易的糾紛都不易有個徹底的解決辦法，雙方的爭執顯然將持續下去，中共既不可能放棄其一貫堅持的原則，也不可能在美國的壓力下完全低頭，而美國也不可能完全漠視中共違反人權的惡行劣跡、不公平貿易措施，華府必然也會爲了防止武器擴散問題而和中共不時發生摩擦，雙方只能嘗試在異中求同，求大同而捨小異。

整體來說，美國和中共關係的改善、惡化都會有其限度，雙方方面都有現實的需要保持往來，維持對話。用中共的統戰術語來說就是軟硬兼施，既聯合又鬥爭的局面，雙方都不會軟到喪失立場，放棄原則，但是也不會硬到使彼此的關係破裂。只要我們掌握了這個基本原則，知道「中」美關係的上、下限，可能變化的程度，就不會因爲「中」美關係一時的變化而感到困擾了。

在未來的十年內，我們有理由可以對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關係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中美關係確實仍有改善的空間，台北也應朝此方向努力，盡力使中美關係的發展獨立於中共和美國的關係之外，也就是說，使中美關係和「中—美關係變成一個非零和競賽的局面。但是台北也不必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期望，在情況不變的情形下，美國和中華民國恢復正式外交關係的可能性確實是微乎其微，美國不可能置中共的可能激烈反應於不顧。

可以預見的是，台北和華府的政治氣氛可能日見好轉，美國高級政府官員和中華民國政府官員接觸的禁令可能放鬆，台北可能可以恢復、或增設一些駐美單位，美國對台軍售的質、量也有增加、提高的可能。但是由於美國政府將把未來工作重點置於恢復美國的經濟活力，爭取國際市場將是重點工作之一，雖然台灣已適度轉移市場，但是我方對智慧財產權、專利保護仍有不足之處，金融自由化也還有待努力，所以美國和台灣在經濟、貿易方面的爭執必將層出不窮，三〇一條款的威脅不易完全排除。

在台灣、美國、中共三角關係方面，如果情況沒有太大變化，美國維持當前這種若即若離的態度，不積極介入，且所持有由中國人自行以和平方式解決的政策仍將繼續。日前美方傳出華盛頓曾對中共所提「統一的中國」的立場有所了解一事，或許出於誤傳，^②我們雖然不必對此傳言太過緊張，但也值得進一步的加以查證、了解，以防萬一。

*

*

*